青島喝酒

商子雍

到了青島喝什麼酒？估計十個人當中有九個半都會回答說：「當然是喝啤酒啦！」也難怪，青島啤酒的名頭太亮、質量也眞好，我在西安常喝的就是青島純生；不過，這一次坐在青島海邊的酒店裡喝青島純生，感覺卻特別好，爲什麼？我也說不清楚。

印象中，山東好像沒有什麼拿得出手的白酒。十幾年前，所謂的「孔府家酒」倒是火過一陣子，但那是靠廣告「轟」上去的，只能曇花一現；況且，人家孔府的人也不認這玩藝兒。上個世紀末，曲阜市政府派代表去台灣拜訪孔子第七十七代嫡長孫孔德成時，禮品中就有包裝豪華的「孔府家酒」，但孔德成瞥了一眼後淡淡說道：「我們孔家沒有這種酒。」

然而，青島朋友告訴我；山東有好白酒，產地就在青島治下的膠南市，其中有一種名叫「小狼羔」，更是不同尋常，說話間，便招呼服務員送這種酒上桌。我因出門前太太曾嚴令不准喝白酒，再加上聽說這「小狼羔」有七十多度，未免心生怯意，再三婉拒，遂和「小狼羔」擦肩而過矣！但這種度數高得邪乎的白酒還是引發了我的好奇心，回西安後滿街去找，竟然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只好向膠南市一位網名「飛霞無限」的網友打問，才知道「小狼羔」原來是「小琅高」，七十一度，一兩半或二兩一小瓶，四瓶一盒，要賣到五六百元……一分價錢一分貨，看來這「小琅高」的質量差不了；只不過須等到再去青島，才能和它唇齒相親了。

天南地北

此次在青島，喝得最痛快的是號稱黃酒北宗的即墨老酒。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去青島及其治下的即墨市旅行時曾喝過這種酒，感覺非常好，遺憾的是回到西安就難見其蹤影。這一次在即墨，慢慢地品嘗，細細地詢問，才知道和把糯米蒸熟後添加酒麴發酵取酒的紹興黃酒不同，即墨老酒是把泡透的黍米放到鍋裡，不斷攪拌添漿，至焦而不糊時添加酒麴發酵取酒，所以，這種北方黃酒獨有的黍米香和焦糊味兒，就特別讓人歷久難忘。

順便說幾句題外話。從青島回到西安的第二天，我前往西漢高速路寧陝服務區給一個培訓班講課，吃飯時有洋縣出產的謝村黃酒，遂忍不住說起前幾天喝得不亦悅乎的即墨老酒。漢中的朋友表示：這黃酒北宗的名號，咱們的謝村黃酒可要和即墨老酒爭一爭啊！我回答說：沒法爭，洋縣在秦嶺以南，謝村黃酒是南方酒。大家莞爾；我還順口謅了一副不怎麼工整的對聯打趣：「榮不管中餐西餐，適口爲上；酒無分南宗北宗，好喝就行。」

把話頭再扯回到「青島喝酒」這個題目上來吧！陪同我遊覽八大關、總督官邸、奧帆賽場等名勝的小王告訴我，如今在青島，小伙子休閑的三大快事是爲「喝啤酒，吃蛤蜊，看小妹」（這一通話，用當地方言來說，特別好聽）。聞聽此言，我連聲讚道：「好啊好！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裡，不是早就有『食色性也』這樣的深刻表述嗎？」

被忽略的才子陳銓

許定銘

醉書亭

一九二〇年代的清華大學有所謂「四才子」：李長之、錢鍾書、張蔭麟和陳銓，其中陳銓長期受人忽略。

陳銓（一九〇三至一九六九）是四川富順縣人，畢業於清華大學外文系，後留學美國阿比林大學，及德國克爾大學，獲博士學位。回國後，先後在武漢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同濟大學教書，抗戰期間與林同濟等人創辦《戰國策》雜誌。陳銓不僅在中德文化傳播交流上貢獻甚大，他還擅長創作，長篇小說《天問》、《革命的前一幕》、《彷徨中的冷靜》和劇本《野玫瑰》、《藍蝴蝶》等，均爲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品。陳銓的書，除了屬於良友文學叢書的《革命的前一幕》外，其餘的都很罕見，尤其上下兩冊，凡十九萬字的處女作《天問》（上海新月書店，一九二八），因出版時間久遠，更是難得一見。《天問》的書名取自屈原的詩篇，寫的是一段浪漫的愛情，故事說原本當學徒的林雲章，單戀愛上了師傅的女兒，女的卻對他無意；林雲章遠走他方，多年後成了軍閥，回來千方百計搶得美人歸後，悲劇也隨之而生……

季進在《陳銓——異邦的借鏡》（北京出版社，二〇〇五）中說：陳銓要表達的是「人生毫無意義，整個人生都是苦痛」的玄思，與其他的五四作家有不同的風貌！

身邊的美好

劉興華

如是我見

我有幾位朋友曾去過國外，均是匆匆而去，匆匆而歸，在國外呆的時間最長的那一位也僅僅是半月有餘；回來後都無一例外地寫出了好像去了一次天堂那種感受的遊記文字，並在一些報刊發表，有的還被一些影響頗大的文摘類報刊所轉載。

我自然是這些遊記的讀者，看了這些遊記後，生出些許感慨：「看看人家外國，多麼文明，多麼禮貌，而咱這以禮儀之邦自居的泱泱大國，相比之下，也快徒有虛名了。」

前幾天，我又看了一篇類似的遊記，說是多倫多遠郊一方空地上，停了一輛警車，一個兩歲小孩奶聲奶氣地嚷嚷着要進警車，警察抱起那個小孩，放在車頂，小孩笑了，在車頂上爬來爬去，警察站在車旁作保護，好像遊樂場的服務員。由此，我們的遊客感慨地說：警察的形象常常就是國家的形象！這就是加拿大。

後來，我們這位遊客又去商店買做洋娃娃的小花布，牌子上寫着一元錢四條，於是挑了四條去交款，售貨員說不對，一元錢十條，並讓這位遊客再去拿六條。這位會寫遊記的顧客不肯，說牌子上寫的是四條；售貨員說，剛剛改成一元錢十條了，那牌子還沒改。於是這位遊客又十分感動地說：像這樣誠實的國民，還需要警察嗎？不過，正是有這樣的國民，才有這樣的警察？有這樣的警察，就有這樣的國民。繞來繞去，繞口令一般，說了半天好人還是要讓好警察管着，天下有這樣的道理嗎？

當然，我並不懷疑這些遊客所寫文字的眞實性，而是對那些自以爲曾感動他們，並不辭辛苦堅持寫出來以求感動國人，兼有啓發教育國人盡快提高素質的小故事眞值得這麼大書特書嗎？

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爲讀這些遊記給我最直接的一個印象就是蜻蜓點水。水裡面是什麼？蜻蜓的尾巴肯定不會知道，但牠卻誤以爲知道了，這不是很可悲的事嗎？

也許在這件事上我對那些去國外的遊客要求高了一些，遊客嘛，自然是走馬觀花了，又不是社會學家，非把一個問題搞明白不可。也許那些有文化有思想的遊客還會笑我白癡，不知道透過現象看本質及一滴水也能折射出太陽的光輝這一道理。

道理我還是懂的，我不懂的是外國人怎麼看待這些遊記，更不知道外國人透過這些遊記又如何看待我們這個民族。絕不是危言聳聽，一個民族假如連這麼點小事都需要進口，這個民族還有什麼希望？

說到這裡，我又想起一件有意思的事，我一位到目前爲止還沒到過國外的朋友，前不久終於去了一次杭州，並驚奇地發現杭州的一些街道有這樣的標誌牌：前面學校，車輛慢行。他也抄起筆來，感慨萬千了一番，這是一座有人情味的城市，這是一座對生命從細小處開始呵護的城市。此文我看了，但看過不久，我無意之中注意到，我和他居住的這個城市，還有鄰近的一些城市，學校附近都有這樣的標誌，只是我們從沒有留心注意罷了。假如不是看了這樣一篇文章，這些標誌我也許永遠不會留意。

這是爲什麼呢？爲什麼總是對身邊的事物視而不見，或麻木不仁？原因也許有很多，但最主要的一條就是對自己生活周圍的事與物缺少一種發自內心的喜與愛，是不是這樣呢？

其實，我們的身邊並不缺少美好，而是缺少發現和發現之後的心靈共鳴。有人說，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亮。更有人說，月是故鄉明。但我希望，只要是美好的，無論中國的也好，外國的也好，我們都應該爲之感動，這樣，我們的生命才會活得更爲完整。

新年話「順」

展　華

文化經緯

每逢新年，在我收到的好友賀年短信中，經常有「六六大順」這句吉語或這順那順的詞語，記得最深的一句是：「祝您心情順、身體順、家庭順、事業順、錢途順、感情順！」日前，我又收到朋友發來一條短信：「現在是六時六分六秒，我在旅館六〇六房間祝您心順、氣順、事事順。把不如意都留給昨天，祝今後每一天都平安順，順順順！」「順」字不但聽着順心順耳，而且必需必求。

在中國人觀念裡和生活中，常把「六」跟「順」劃上等號並非無厘頭。小時候，看到大人們猜拳喝令或者玩麻將投擲骰子時，一旦出現六個點，就會喊叫「六順！」「六六大順！」時下，選汽車牌號，挑手機號碼，擇婚喜吉日等，人們都喜歡「六」這個數字，爲的也是圖個「順利」。在閩粵台僑鄉，自古以來有「送順風」習俗，這也與「順」有關。在僑鄉，凡有人出國或者華僑回國後又將返回僑居地，他（她）的親朋好友和鄰居習慣贈以禮品，有的特意備辦「送順風桌」（酒席）餞行，祝願渡洋一帆風順，平安抵達。因爲舊時人們出國謀生或經商沒有飛機可乘，都是坐帆船。帆船在航行中最怕逆風，而需要的就是順風，這樣才能既安全又快速，故形成「送順風」之俗。

中國人崇尚「六」的歷史悠久。周代初，周公旦制禮作樂，建立典章制度，官制禮儀等都按「六」來安排。例如：「六官」，指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種職官；古代學校教育的六門課程叫「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婚嫁迎娶的六種禮儀謂之「六禮」，即納採、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中醫學上風、熱、濕、火、燥、寒稱「六氣」；漢字造字的六種方法稱「六書」，即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古代儒家立身行事的六條準則稱「六本」，即孝、哀、勇、能、嗣、力；考察人的六種方法叫「六徵」，即觀誠、考言、視聲、觀色、觀隱、揆德；天地及四方之色爲青、白、赤、黑、玄、黃「六采」；規、矩、權、衡、準、繩爲「六法」；苦、酸、甘、辛、鹹、淡稱「六味」；《詩》、《書》、《禮》、《樂》、《易》、《春秋》爲「六經」。

從隋唐開始，中央行政機構設六個部門以分掌全國各類事務。隋代是吏、民、禮、兵、刑、工六部，唐代爲避太宗李世民諱，改民部爲戶部，此後歷代相承，一直到清代爲止。宋代元豐年間，專門把《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尉繚子兵法》等六部兵書彙編成集，取名爲《六韜》。明代嘉靖時，蘇州書商把老子、莊子、荀子、列子、楊子、文中子六人的書合編刻印出版，取名《六子全書》，都跟「六」有關。類此用「六」歸納的數量詞和事物還可以列舉相當多。總之，自古以來「六」就是一個備受國人喜歡的吉祥數字。我們的祖先還習慣用「六」的倍數「三十六」來表示衆多之意，兩千多年前的《南齊書・王敬則傳》中就有「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策」一說。後人經常借用「六」的倍數，古典名著《西遊記》中寫到「天罡三十六，地煞七十二」，我們經常用「三十六計，七十二變」形容計謀多端，靈活善變。有一句常言：「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泛指天下所有行業都有出類拔萃者，這些數字也都是「六」的倍數。至於店號、商標、名字冠以「六」字的更是多如牛毛。

「六」與「順」扯上關係主要出自三種說法：其一，可能來自《易經》，《易經》中有六爻之說，六爻與六爻相重爲一別卦，可能是其中一卦爲順利之意，故延用六六大順的說法；其二，《左傳》中記載，「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謂六順。」這裡的「順」，指的是人與人之間、上下左右之間的關係；其三，來源於「三三不盡，六六無窮」的傳統觀念，「三」是一個可以無限延伸的數字，推而廣之，「三」的倍數「六」也具備了同樣的性質。閩南和台灣人小孩出生後，取名時喜歡把「順」字嵌進去，當地人名這順那順特別多，如興順、進順、添順、茂順、來順……，但是有個特點，那就是當地人叫人名習慣把首字改叫「阿」，這樣當你在人群熙熙攘攘的街市大呼「阿順」，循聲回望者便會不少。前不久一個節日，一位外地文友到我閩南老家作客，他不信我們閩南人名的「順」那麼多，我說，我在熱鬧的街市大聲喊：「阿順！」你用手機的攝像功能拍攝下來，看有多少個回望。果不其然，我一喊，在四五百人的人群中就有十五六個人在東張西望，閩南人愛順及名由此可見一斑。

新年到了，無論個人還是團體都要有祝願，「順」是頻率最高的選擇。因爲行行業業、家家戶戶、方方面面都需要「順」。社會穩定，國家發展要「順」；家庭平安，生活幸福要「順」；夫妻和諧，和睦同心要「順」；前進的道路上，事業的進展中更需要「順」。孔子在《論語・爲政》中說：「六十而耳順。」意思是人到了六十歲，進入了老年，什麼言論都聽得進去，什麼言論都能知其意思。其實，我們做人行事，都應當學習孔子的「耳順」，不必等到年屆花甲。只有「耳順」，才能兼聽則明，工作順利。

筆者說「六」話「順」的意思，也想與讀者諸君共勉：爲人處事都要講究一個「順」字，奉養父母要慈敬孝順；夫妻之間要體貼溫順；著書行文要文從字順；投資興業要名正言順；性格心情要平靜柔順；正確正義的事要百依百順；養生保健要順時頤養；旅遊作客要隨順習俗；處事決策要應天順民。總之，無論國家、家庭還是個人，都不能違悖情理，而必須順應天時，順應地利，順應人和，順應歷史潮流。這樣才能有實實在在的「六六大順」！

生機在望

（攝影）楊芳菲

細讀序跋

錢續坤

燈下集

作者對出書的願望向來都是很大的。將發表的長文短句篩選結集，或把新著的佳構妙製整理成冊，付梓之前總會覺得缺少點什麼，那就是序。

序又作「敘」，或稱爲「引」，古代多將其排在書的末尾，如《史記・太史公自序》；後來一般放在書的前面，所以又叫「前言」，而謂列於書後者爲「跋」，亦稱「後序」；由於兩者體例略同，於是又合稱序跋文，內容在於說明書籍著述或編輯出版的意圖、宗旨、過程、編排體例及作者簡介等，它可以由作者本人扼要歸納全書的主題及對有關問題的寫作心得，也可以由旁人對作者和作品作出中肯概略的評價。不過這旁人大抵是不凡的，不算權威也稱得上名流，至少可作師長，因此讀到那些言簡意賅、坦誠直陳的序文，我總要反覆地認眞誦讀，時間久了，便很自然地讀出其中的「味」來。

近讀《鄭板橋集》，發現其小引就頗耐人尋味。鄭板橋的這篇小引是以序論序：「板橋詩文最不喜求人作敘（序），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爲恥；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譏帶訕，遭其荼毒而無可如何，總不如不敘（序）爲得也。」這種以「借光爲恥」、「不趨名流」的品節，不僅是其錚錚鐵骨的眞實寫照，而且與當今那些言不及義、無病呻吟的應酬之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此從這種意義出發，作序應該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眞正有見識的人對其應是愼之又愼的，因爲好的序文不但能定評一部作品、一個作家，有的還能成爲一篇有價值的文論，對後人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魯迅一生就寫了許多序文，其《〈吶喊〉自序》既說明了自己創作小說並把小說命名爲《吶喊》的緣由，更重要的是從其生活經歷和思想發展中，反映出了他在那個歷史時期的社會觀、文藝觀和創作態度；同時，他還鼓勵青年作家走上文藝創作的道路，並爲他們不辭勞苦地作序，如葉紫的《豐收》、蕭紅的《生死場》、柔石的《二月》等，這些序文都已成爲現代文學史上珍貴的文藝評論資料。另外，朱自清序俞平伯的《燕知草》、周作人序劉半農的《揚鞭集》、汪曾祺序何立偉的《小城無故事》等，讀來不禁令人拍案叫絕，擊節吟哦！

但最近讀一些新版書籍的序言，言之及義者，或有眞知灼見者，實在不敢恭維，更多的則是一些酬酢之言，敷衍之詞。其因估約有二：一是請領導作序，領導忙於公務，耽於應酬，對寫序之書自然不甚明瞭，有的雖也能將旗幟挑出，然結果並不易被讀者理解與買帳；二是請名人權威留言，懷有不同目的，或識或不識的作者求到門下，礙於情面，也只好說陽台上的花如何，講窗沿下的貓如何，侃茶杯裡的茶如何，如此如此千把字便打住，簡略倒也簡略，可是我總覺得那實在是如同嚼蠟，寡淡無味。因此爲他人作序，至少應具備以下兩個條件：同著者的關係；對作品的見解。尤其是後者，更要從所序作品的實際出發，不以諛詞自欺，不以誑語亂彈，這樣的文字對作者才有裨益，對讀者才有教誨。一九三二年，現代作家陽翰笙的長篇小說《地泉》再版時，約請茅盾爲其作序，茅盾直言相告：「要我寫序，就得批評你的作品。」後來茅公用了將近一半的篇幅，分析了作品中存在的公式化、臉譜化等缺點，陽翰笙也一字未動地編進了《地泉》的新版內。這段文壇佳話的意義，我想遠遠超過了小說與序文的本身。

我們歡迎的是有理趣、有眞知、不拘一格、引人入勝的序跋，那些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含含糊糊的話語，還是退避三舍爲好！

尊貴的盲人

劉荒田

名居人語

午間，風和溫度都恰到好處的舊金山納山公園。上好陽光製造美好節日，園裡盡是享受自然的人。略無纖雲、乾淨得教人恨不得栽進去泅泳的藍天，它的邊緣有鞦韆在靈巧地擺盪。一對情侶，偃卧在草地的溫柔鄉，以省得不能再省的布料，盡最大可能地讓太陽烤成三分熟的龍蝦。

我從人群中穿過。噴泉的水花，被藍天襯托成嘩啦啦地笑的翠玉，不經意地灑在池子外。有人在高聲叫：「向右，對了，再向右！」發號令的，是歐洲口音的中年男子，赤裸上身，坐在噴泉附近的長椅上，聲音帶着炫耀的得意和施惠於人的優越感。我循聲看去，是一個高個子白人，正在一排長椅上摸索。我再細看，是盲人，他正在根據指令去尋找屬於他的白杖。摺疊式白杖，是盲人的專利品，過馬路必不可少的憑藉。「再過一點，摸到一件夾克沒？前襟上有個徽章的？那是我的，從夾克再過去一英尺，就是你的白杖。」盲人把白杖拿到手，向歐洲佬說聲感謝，卻沒馬上離開。他挺直高大的身軀，揮動白杖，做起只有他自己才叫得出名堂的體操來。盲人的上身裸着，胸毛被陽光照成直立的草原，隨身體的移動閃着微光。藏青色長褲，兩道熨摺和白杖一般筆直。不甘寂寞的歐洲佬爲他當啦啦隊隊長：「嘿，棒極了！再來，一二三，一二三！」周圍的人，都微笑地盯着盲人。專心看書的老人，把書放在膝蓋，熱烈鼓掌。盲人一本正經地操練，一個段落結束，便向發出聲音的地方揮手道謝，我深深地感動着。啊，一位和光明無緣的強者，尊貴地生活在太陽下！

他是太陽下的奇跡。四十來歲，臉上的鬍子刮得極乾淨，頭髮一絲不亂。太陽鏡滿稱職地掩蓋住唯一的缺陷。我從來沒看過，一個絕對不需要鏡子的人，全身上下整齊和鮮亮，竟超過在場的所有男人。多帥氣，多高貴！我甚至推測，他受過良好教育，是優越的專業人士。他的魅力來自自尊，而自尊，是來自他和大家共同的認知：作爲和命運對峙的強者，是值得尊重的。

話說《百家講壇》節目

文　佳

繽紛華夏

一段時間以來，央視《百家講壇》將死的資訊成爲國內媒體關注的焦點，也成爲報端最吸引人眼球的內容。有媒體曾透徹分析其原因，甚至宣稱：《百家講壇》已經進入「死亡倒計時」。在筆者看來，根本原因是國學在市場化、商業化的今天，成爲商業運作的載體與工具，才是《百家講壇》之殤，文學之殤、國學之殤。

中國有豐厚的文化積澱，市場化的大環境使人的思維隨之改變，經濟的發展使內地民衆在肚皮與腰包鼓起來的同時產生了對古文化的訴求。央視作爲中國最權威的傳播工具，便擔起此歷史重任。《百家講壇》開播伊始，擔綱主講者皆爲各學科頂尖學者，雖然節目不溫不火，但在「讓專家學者爲百姓服務」，「做學術大師與普通百姓之間的橋樑」方面，的確做了很好的嘗試。

然而二〇〇四年《清十二帝疑案》的熱播，讓欄目一下子參悟到了發展新招，那就是走商業化發展之路，藉勢造勢，包裝打造自己的學術明星。於是乎，一批靠演講，吃嘴皮起家的「學術超男、超女」紛紛被打造出來。講壇很快完成由「純學術」到「泛娛樂」的轉型。包裝多了，炒作多了，歪說戲說多了，懸疑與噱頭多了，一些諸如「劉邦是同性戀」、「寶玉不善性行爲」等奇談怪論，讓講壇充滿了媚俗氣息，越來越像娛樂類脫口秀節目。

學術娛樂化與欄目商業化着實讓欄目收視率一路飆升，出了一大批名人，各自得到了一筆不菲的收入，然而它在經歷七年之癢後，便成了新聞傳播研究人員剖析解讀的經典案例。

二〇〇六年，上海文藝出版社以五百萬元、首印五十五萬冊奪得易中天《品三國》（上）的版權，開啓了中國圖書出版版稅最高記錄，該社二〇〇六年總囊六千萬的碼洋，有三千多萬是易中天的「貢獻」，易中天有兩年內的收入分別高達八百萬和六百八十萬人民幣之多。

于丹的《〈論語〉心得》起印數高達六十萬冊，二〇〇六年的一個月內，該書的銷量突破了百萬冊。《〈莊子〉心得》首印更是高達百萬冊，創下近十年暢銷類圖書首印的最高紀錄，而當年于丹版稅收入高達一千零六十萬。

要讓他滅亡，先讓他瘋狂，這樣經典的語言似乎是《百家講壇》之殤的預言。台灣學者李敖幾年前就也曾指出：《百家講壇》將學術文化做成娛樂文化節目，雖然「不失爲一種成功的商業化轉型運作」。但欄目採用「娛樂界包裝影視明星的手法來打造『學術明星』」，卻是一種「媚俗行徑」。此做法從短期看或許能贏得收視率，而從長遠來看，「卻會降低央視科教頻道的學術文化品位，可謂是一種得不償失的急功近利之舉。」

現在看來，當年曾經引以爲傲的一套商業運作模式：選秀、包裝、造勢、出書等，現在都不再靈驗。在過去幾個月裡，這個曾輝煌一時的欄目頻遭冷遇，收視率已跌出央視科教頻道前十名，書市人氣直線下落。

事實上，作爲文化品位、科學品質定位的文化學術類欄目，應維護文化的尊嚴和風格，文化搭台，商人唱戲的商業化模式，不僅讓欄目走不遠，也會毀了文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一研究員認爲，那種以國學搭台，商人唱戲的模式是「打着國學的幌子去謀利」，「過度市場化會毀了國學」。